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布哈林和文化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文坛出现一个颇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它以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为指导，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据点，宣传在空白地上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尽管他们在普及大众文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们的一些领导人闭门造车，企图在实验室里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的狂热努力，无疑给苏维埃文化事业造成了损失。

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群众文化活动，列宁是支持的。但是，列宁坚决反对他们抛弃人类文化遗产，关起门来杜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一切企图。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是一

致的，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

布哈林曾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热心支持者，十月革命后有一段时间他的观点接近于无产阶级文化派。1918年7月23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书评栏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化》杂志的评论，表示同意它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化教育运动的必要性的思想，这种运动是同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并行的工人阶级的运动的特殊形式。”布哈林完全同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这一关键立场，只有一个保留：“如果抛弃波格丹诺夫所固有的、在杂志上常常见到的某些夸大和偏向。”与此同时，他也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验室”的提法，不过他反对“实验室脱离政权机关的法律命令而独立的要求”，认为“当国家机关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工人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能（也不应当）不服从法律命令”。^① 该杂志第3期对布哈林的书评作出反应，表示“满意地欢迎布哈林同志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种熟练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但不同意有关法律命令的提法。1919年布哈林在《“复仇者”》一文中宣称：“旧剧院应当摧毁。谁要不懂得这一点，他就什么都不懂”。^② 1922年10月9日他在《工人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消灭教育中的人文倾向而代之以实际技术知识”。^③ 1920年10月9日政治局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时，布哈林在给列宁的条子上表示不同意利用文化遗产的提法，认为“‘夺取’全部资产

① 布哈林：《革命和文化》，莫斯科1993年版第7—8页。

② 见《真理报》1919年12月16日。

③ 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阶级文化,正如‘夺取’资产阶级国家一样,不摧毁它是不行的,……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体系是在其组成部分的另一种联系上为无产阶级所吸收的”。^①

在艺术实践上,布哈林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热心提倡者。1919年秋,正当尤登尼奇攻到彼得格勒城下、邓尼金威胁共和国中部之际,布哈林到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观看了《红色真理》一剧的彩排。10月16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短评《同白军的斗争和戏剧》,称赞此剧的上演对群众的影响要比几十次群众大会强千倍,并对没有像样的演出场地表示不平。1926年当《劳动报》攻击梅耶霍利德剧院上演的《怒吼吧,中国》时,正是布哈林出来为之辩护。在此期间他经常出入工人剧院、红军剧院和梅耶霍利德剧院,这些地方斯大林是从来不去的。

可以看出,布哈林不属无产阶级文化派,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同他们有共同之处,正因为这样,托洛茨基甚至把布哈林叫做无产阶级文化的“保护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间存在分歧。

托洛茨基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的。他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估计得比较乐观,认为有20—50年就足够了。无产阶级在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之前,其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

其次,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没有可能去掌握人类的文化遗产,而夺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在专政时代是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的,即谈不上具有最伟大的历史规模的建设的;而当专政的铁钳已无必要的时候出现的、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化建设,将不会再有阶级性了”,“无产阶级专

^① 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388页。

政并不是新社会中管理生产和文化的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秩序。”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无产阶级掌握文化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为全人类文化开辟道路。所以他得出结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在我们这里大概在十分之三的场合下是不加批判地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下指无产阶级的个别集团掌握无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个别要素的事实,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下,谈论的概念和文字是如此混乱,以至完全不知所云。”^①当然,他更不同意无产阶级文化派关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实验。他写道,“事情被理解成这样,似乎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在实际上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在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个阶级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②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托洛茨基表示支持。他说,“让我们约定,共同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学文化的运动,亦即为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③1924年5月9日他在俄共中央文学讨论会上在回答协会领导人普列特涅夫时重申:“我答应您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存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将支持,但在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抽象概念这一问题上,我是完全反对您和您的保护人布哈林的,我是完全赞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④

十月革命之后布哈林也曾是激进的世界革命拥护者,指望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上册第378—386页。

② 同上书,第384页。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④ 同上书,第545页。

在几天几星期内世界革命大功告成。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开始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渐进的、比较缓慢的有机发展过程,一种进化过程。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完全有时间创造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是错误的,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忽略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不平衡性。例如,一个国家取得了政权,而另一个国家尚未取得政权,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延长了。布哈林在1925年2月的上述会议上指出,托洛茨基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或者说,“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托洛茨基从这一错误估计得出结论: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这一特点发展得比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快得多。布哈林认为,旧文化在“消散”,而无产阶级文化则越来越快地“在形成”。^①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特征。所以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会具有自己的特点,如集体主义精神、都市主义的情绪等等。“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其特点的。毋庸置疑,这些特点将不可避免地被固定并记录下来。在城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未能完全解决城乡矛盾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将给整个文明打上烙印,包括文学在内。不管我们如何实行消除城乡矛盾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它消亡的过程快得多。”^②

撇开文化问题不谈,这里的根本分歧是对过渡时期的估计

① 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389页。

②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339—340页。

问题。在这一点上，布哈林的估计显然要现实得多，实际得多。至于无产阶级文化，那么它的概念在那个时候就已是明确的，论者各有自己的理解，并不存在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谈无产阶级文化只能是各讲各的，谈不到一起去。

在这一点上，在布哈林和列宁之间也存在分歧。1922年9月27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列宁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对文章作了批注，寄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种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东西来虚张声势的昏话，指出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要编辑部予以批驳。接着列宁又同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雅可夫列夫多次谈话，让他写文章批驳普文，10月19日，雅可夫列夫把第一稿交给列宁，但是布哈林对文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看法，拒绝予以刊载。23日在有作者、布哈林、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在列宁处讨论了该文，最后定稿。从次日起分两日在《真理报》上发表。

1925年2月在俄共（布）中央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布哈林曾坦率地谈过这段历史。他说：我没有理由污蔑自己，“在我同弗·伊·争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列宁是反对布哈林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的观点的。布哈林说，他在同我的几十次谈话中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给我写过一些便条，甚至“怂恿”雅可夫列夫同志写文章。雅是根据列宁的直接指示写那篇文章的。我就这件事同列宁谈过，当时我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他坚持在《真理报》上发表雅可夫列夫文章的第一稿，我就将给以尖锐的反击。于是，列宁劝雅可夫列夫删去文中的一些段落。

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也是很差的”，我们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因此，目前摆在广大群众面前的问题是掌握起码的文化知识，而不是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所以雅可夫列夫的文章强调，首先应当学会文明生活，防止头上生虱、床上长臭虫，养成工后饭前洗手的习惯，不以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为荣，扫除文盲，消除官僚主义，等等。他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这真正‘落后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应当为‘资产阶级文化’而斗争”？^① 布哈林对列宁的思想是这样概括的：“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高谈阔论，因为我们在实践中还未能实现它之前，高谈阔论依然还是高谈阔论。”^②

列宁和布哈林的分歧到底在哪儿，布哈林本人讲得并不清楚。最根本的一点是列宁基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的存在，他支持作为群众文化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但是坚决反对他们臆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他虽然有时也使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个词，但赋予它另外的含义。例如他在1920年10月11日给布哈林的便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这就把无产阶级文化的出现推到遥远的未来了。如上所述，列宁多次以学习全人类文化、学习资产阶级文化去同臆造“无产阶级文化”相对立，他认为，在俄国普及一般文化比创造无产阶级文化

① 参见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49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1页。

要重要得多。所以他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中写道“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①而布哈林承认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他不否认普及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还有提高的任务,否则就形成不了无产阶级文化,而无产阶级文化理应高于资产阶级文化。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也补充说,除了普及文化的任务,还应当研究高级文化问题。布哈林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他说,“应当在广泛的战线上开展文化工作。主要的注意力要放在消灭文盲上,但不应当忘记熟练干部”。他举例说,如果我们现在只让所有人学文化,而不培养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姑且不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授),那么教课的就不是我们的教授,而是其他的、异己的教授。而我们要教谁呢?教那些中间环节,那些最不成熟的群众。那我们在这里把事情搞坏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既然我们讲的是千百万人中间的政策,我们就应当强调消灭文盲,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培养干部的技术力量这比较狭窄的领域不应当提出另外的问题。

其次,在对待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上两人的态度显然不一样。从本世纪初 1905 年革命失败以来,列宁一直对波格丹诺夫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先是对他的“经验一元论”,后来是对他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中多次批评书中使用波格丹诺夫术语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布哈林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却多少有些偏爱。他在自传里承认对经验批判主义有过“异端的爱好”。他一直反对完全否定波格丹诺夫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334 页。

理论。1921年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阐述了宗教的起源后写道：“上面介绍的宗教起源学说，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学说应归功于亚·波格丹诺夫；是他在《社会心理学》文集中第一次提出的。后来的专门研究完全证实了这种推测。”^①1920年针对波格丹诺夫主义的复活，列宁再版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此他请涅夫斯基撰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作为此文的附录。列宁介绍说，涅夫斯基“有充分的可能确信，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②布哈林对涅夫斯基的文章颇不以为然，他给列宁写便条说，波格丹诺夫过去持承认哲学的观点，而现在却废除哲学，代之以“组织形态学”或“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布哈林写道，“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不属于经验一元论，而属于另一个方面，对它可以争论，但至少需要把它弄明白。而涅夫斯基却连这个最低要求都没有做到”^③直到1925年布哈林还认为，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好的想法。似乎可以说，有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称呼它的，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同正在进攻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特征的结合……”^④

第三，列宁作为政治家、布哈林作为理论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列宁特别关心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独立于党之外并领导文化事业的要求。据卢那察尔斯基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11页。

③ 见同上书，第49卷第569、768—769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0页。

回忆：“列宁担心波格丹诺夫主义，担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里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倾向、科学倾向，而最终产生政治倾向。他不愿意在党的旁边建立一个与之竞争的工人组织。他要防止这种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他给我以个人指令——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向国家，服从国家的监督”。^① 尽管布哈林在 1918 年已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脱离无产阶级国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在这一点上布哈林主要是作为理论家考虑问题的，在分寸上同列宁有所不同。

从理论上说，用提高文化去补充普及文化，这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列宁那时强调普及文化是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的。这一点布哈林经过几年的观察和实践才有比较深刻的体会。1928 年 1 月他在纪念列宁逝世 4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列宁在晚年致力于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农民合作化，为此需要一场文化革命。另一个是反对官僚主义，改造国家机关，这同样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这就是时代的伟大的文化组织任务”，对列宁来说，处于中心的是群众。布哈林回忆说，许多年前有过关于文化任务的争论，许多人在十月革命后想立即升入天堂，心向神往，打算立即在科学技术的一切部门进行革命，某些人幻想用实验室的实验办法制造无产阶级文化。对这样提问题，列宁进行了猛烈攻击。“他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行动的。他正确地担心，人们热衷于臆造的、狭隘的实验室的、温室里的问题而抛开群众性的、最起码的，正因其起码而显得绝对必要的文化需要。他用同诸如贪污、共产党员的自大狂、文盲之类的东西作斗争去对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空谈’、‘空话’，其原因就在于此。”“问题不在于立即把所有的科学颠倒过来，问题

^① 布哈林：《革命与文化》，莫斯科 1993 年版第 11—12 页

在于瞄准识字和文化的最基本的敌人，以最快的速度摧毁之，把这些任务放在首位，把我党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用殊死的战斗去打击这一敌人。”^①可以说，到这时候，布哈林实际上已承认，他同列宁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消除，不是说布哈林错了，而是说他进一步理解了列宁主张的针对性和迫切性，看到了列宁那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眼光。

顺便讲一下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是承认无产阶级文化的。1925年5月28日他在东方民族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人类的文化。“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②斯大林这里用了一个“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矛盾用语。全人类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无产阶级文化是阶级文化，它是全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全人类文化则是人类历史上阶级文化的总和。而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阶级之后出现的全人类文化中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化。因此，说“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表示此文化属于全人类则可，把无产阶级文化等同于全人类文化，则缩小了全人类文化的内涵，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社会主义和文明

俄国是个文化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对这一基本国情布哈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5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7、119页。

林是看到的。但是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布哈林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革命之初他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立即取得胜利上，指望他们胜利后给予落后的俄国以经济技术的援助。所以他坚决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不久他承认了错误，改而到国内寻找出路，把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提到首要地位。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特点和俄国国情的深刻分析的结果。他曾打算写一本专著《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这本书没有问世，只发表了其中的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把这两种不同的革命做了深入的比较。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的组织，它们的机构是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整个地，即同它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城市里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两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怀抱中整个地，即同生产机构的行政上层一起成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是：1、新经济的物质骨架，已经积聚和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技术上可能的劳动调节过程；2、无产阶级；3、组织、行政、指挥的工作人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4、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能成为未来行政机构的骨干的工人组织。顺便说一下，这显然比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是在“空白地”上产生的说法有说服力得多。两个不同时代的革命阶级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区别：“不受剥削的资产阶级放在封建主义的环境中已经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所推翻的阶级；反之，经济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可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必须推翻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①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制度内已经是工业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5页。

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生产的指挥者,资本主义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文化有可能在敌对制度内成长起来。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发展自己的文化,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落入这个阶级手中,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教育的垄断者。贵族的、骑士的学校迅速让位给工商业学校。因此可以说,在封建制度内,资产阶级文化已经高于封建农奴主文化。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前在文化方面已经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然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却不相同。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与此相适应也垄断了教育。无产阶级所获得的技能,只是从事体力劳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技能。“工人阶级不能不成为在文化上深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机构压迫的阶级;这种受压迫的现象,对于夺得国家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而言是比较高的,例如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艺术家、法学家等等。布哈林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不能把这些条件发展到能够培养自己去组织整个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来得及训练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并且成熟为社会的组织者。”^①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53 页。

这一点在 1923 年 2 月《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的报告中讲得更清楚。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起来，这个阶级有能力砸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剥夺资产阶级，镇压内部敌人的反抗，也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残余的反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不可能作为一个善于全部完成新社会的组织职能的阶级成熟起来，不可能全部完成，也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只能在过渡时期逐步完成。^①

布哈林在这里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天不足之处，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落后于资产阶级的事实。看到并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会千方百计地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克服自己的不足，掌握管理国家和工厂企业的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列宁所说的不仅夺取俄国，而且还要管理俄国。

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问题还有更严重的另一面，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文盲众多，科技落后。在这样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困难的。同列宁一样，布哈林也认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相对来说夺取政权比较容易，而要巩固政权，进行建设则要困难得多。这是俄国的国情。

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有被文化更高的资产阶级战胜的危险。他举了一个列宁也经常说起的例子。历史上常有野蛮的部落征服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胜利者被人家从下面削弱了。过去的胜利者掌握了被战胜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每次都是这样发生的：“社会的必然性要求比征服者所能提供的技能更高的文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91 页。

化力量来执行职能”。那时，文化较高的被征服的阶层有意无意地逐步实行渗透，不知不觉地慢慢站到胜利者的位置上去，并使他们在一切方面实际上服从自己的影响，从而把他们同化了。布哈林指出，这种现象也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可以简单地镇压敌人，工人阶级可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集团，在物质上可以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有可能被自己敌人的文化更高的力量从下面吃掉”。“这种危险必然摆在每个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前”。因此，布哈林认为必须正视事实，必须承认，俄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相比是不学无术的，要大声疾呼：我们什么也不懂。^①

同这一危险相联系的是另一个危险，从敌对或半敌对的社会阶层中产生新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再次成为被剥削阶级。一方面是从部分耐普曼中、从部分知识分子中可以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然而，“还有另一个可能是更加本质性的危险”，这就是“甚至无产阶级出身和异常粗糙的手以及其他优秀的无产阶级属性，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变成新的阶级”。布哈林认为，这一点他必须坦率地、毫不掩饰地指出，“这是我的职责”。他说，如果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脱离了工人群众，他们凭借这种出身而长期占据垄断地位，那么他们也可能变成特殊等级，变成新的阶级。他解释说，如果工人阶级第一批进高等院校学习的人形成了小圈子，后来受高等教育的只是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那就会形成一个排他性集团，作为教育的垄断者进行统治，这样他们就会形成垄断的特权阶层，蜕化为一个新阶级。对于这种危险，一方面只有用文化力量在数量上的优势去解决，这就是俄国工人阶级要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干部，逐步代替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96—97页。

旧知识分子和旧职员，他们在质量上不比旧的低，数量上又比旧的大，另一方面，获得教育的工人干部不要自我封闭，不要搞垄断。“如果能保证从工人群众本身中源源不绝，与日俱增，形成来自工人阶级的补充阶层，我们会胜利，我们就会在这方面排除这个深刻危险”。换句话说，必须让更多的工人受教育，得到技术训练，掌握管理的技能。这样，就可以从文化教育方面防止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蜕化。

在1921年问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蜕化的危险是这样说的：在过渡时期，由于工人阶级不是在它成为单一成分时取得胜利的，是在生产力衰退和广大群众生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蜕化’的倾向即分化出一个作为阶级的萌芽的领导阶层的倾向，是必然存在的”。但它也被另两种相反的倾向所抵消：“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教育垄断的消灭。从整个工人阶级中扩大再生产出技术人员和组织者，将动摇可能发生的新的阶级分化的根基。”至于斗争的最后结局，将取决于何种倾向更为强大。^①

指出工人阶级蜕化的可能性，并提出预防的办法，这是布哈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

当然，在俄共（布）党内看到蜕化的可能性的并非布哈林一人。1924年2月布哈林在为纪念列宁而作的报告《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中谈到，他曾写文章论证过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和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之间的巨大原则差别，后来又继续予以发挥，在理论上加工提高。他真诚地相信“已经在这个小小的理论领域中，在一定的小分支里总算说了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新看法”，然而，布哈林发现，他所说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369—370页。